

抓住时机

——美国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
世界上面临的挑战

SEIZE THE MOMENT

[美] 理查德·尼克松 著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刘炳章

卢佩文 张 今 译

抓住时机

——美国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
世界上面临的挑战

京新登字110号

SEIZE THE MOMENT

—America's Challenge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by

RICHARD NIXON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1991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91年英文版译出

抓住时机

——美国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
世界上面临的挑战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刘炳章 卢珮文 张 今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插页2张 188,000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676-8/D·313 定价: 6.80元

(内部发行)

出版前言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最新著作《抓住时机》，是他发表回忆录《角斗场上》之后所撰写的第九本书。作者在书里就当前世界形势和美国所宜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认为，现在，美国“有一种历史性的机会来改变世界”，为此必须紧紧“抓住时机”。他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著名词章：“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并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从反面借用其意作为此书的书名。

尼克松在1990年开始为撰写此书作准备，1991年9月完成。其历史背景是，在此以前的三年中，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88年，他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曾针对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新思维”，提出了不战而胜苏联的目标和谋略。其后，东欧发生剧变，海湾爆发战争，苏联崩溃瓦解。尼克松自然为此高兴，但他也感到，世界新旧矛盾交织，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他认为：“在出现1989、1990、1991年的动荡局面以后，是美国重拨它的地缘政治罗盘的时候了。”在他看来，美国面临挑战，“必须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重新确定美国的全球使命和重新制订美国的战略。根据美国的利益需要，他在书中各章分别就美国对前苏联地区、欧洲、太平洋地区、穆斯林世界和南半球的政策提出了建议。

尼克松的愿望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保持它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充当“历史航程中的领航员”，并把下个世纪铸造成为“第二个美国世纪”。因此，他竭力反对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思潮。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按照我们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尽管按照他的观点来说，“共产主义遭到了失败”，但是他还是心有余悸地说：“共产党政权仍统治有13亿人口的12个国家”，而且与美国“对立的思想并没有被赶下舞台”。他大声疾呼要“振兴美国”，但是对于美国所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世界的现实是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尼克松所期望的美国独霸世界，当历史的领航员，是注定不能实现的。

尼克松在书中用不少篇幅谈论中国。作为一贯反共的右翼人物，他对中国的形势、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看到：“中国成为全球性重量级国家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中国“不但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政治角色，而且可能在今后几十年内成为重要的全球性经济强国”。他还认为，“美中关系所牵涉的利害关系太大”，因此，他反对“孤立中国”，而主张同中国保持关系。他不隐讳，这是为了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促使中国和平演变。

尼克松这本书虽然充满攻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滥调，但是对于了解美国政界的观点，研究美国统治集团的政策趋向，仍是有用处的，因此我们将此书译出作为内部书籍出版，提供各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参考。

新 华 出 版 社

1992年2月

原书内容提要

在这本出色而又及时的著作中，既富于幻想又讲究实用的理查德·尼克松，阐述了美国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一个复杂得多的新时代的开始而在今天面临着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

由于共产主义崩溃，美国现在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划分为由两种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所鼓舞的两大集团。许多人都要求美国在我们取得冷战的胜利以后退入沾沾自喜的孤立主义状态，但是只有美国的领导才能够在今后一个世纪中引导动荡不安的新世界走向自由和繁荣。这个未来的世纪将成为一个新的美国的世纪。

在冷战结束之后，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三种流行的“神话”——说什么随着共产主义的失败，“一种历史已经结束”；说什么军事力量已经无用武之地；说什么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尼克松对这三种神话给予有力的驳斥，规划了为着确保历史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时刻所带来的大好机会不致被浪费，美国今后所必须走的道路。他断言，现在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而是唤起西方为了争取民主原则和自由市场原则在东方的实现去争夺最后一战的胜利的时候。

尼克松详细论述了前苏联发生的变化，不但阐释了我们帮助

前苏联人民的最好办法，而且阐释了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最好办法。他的论点的根据就是他长期以来在苏联事务上的无与伦比的经验以及他前不久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未遂政变的许多领导人的亲身接触。尼克松给苏联重要政界人物勾勒出的第一手画像，既入木三分，又十分真切，因而不但具有新闻价值，而且令人神往。凡是想要了解对他们和对我们都具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大局的美国人，都必须一读。

尼克松接着又根据他自己特有的丰富历史知识、政治远见和政治家的直觉，分析了世界每一个地区的形势，研究了美国在欧洲、太平洋沿岸地区、穆斯林世界和不发达世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最后，他根据自由、机会和个人责任感三种理想，对振兴美国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作了中肯的分析。这三种理想不仅是美国成功的关键，而且对于希望效法我们的榜样的各国来说，也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抓住时机》一书要求我们去追求比“世界新秩序”更崇高的目标——把我们的抱负定得比实现和平和稳定更高。毛泽东在同尼克松总统最后一次会晤的时候，向他提出过一个深刻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标吗？”尼克松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是，这种和平不止是没有战争——它是“一种正义的和平”。

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九本书——可能还是最重要的一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和平。

目 录

原书内容提要

1、现实的世界.....	(1)
2、前邪恶帝国.....	(26)
3、大西洋大家庭.....	(88)
4、太平洋三角.....	(118)
5、穆斯林世界.....	(156)
6、南半球.....	(191)
7、美国的振兴.....	(225)
作者后记.....	(257)

现实的世界

20年前，我曾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中美两国开始建立新关系祝酒，当时我援引了毛泽东写的一首激励他的追随者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努力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只争朝夕。”* 今天，当我们庆祝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失败和波斯湾侵略失败的时候，国内外仍然有许多事情有待我们去做。我们必须抓住时机** 争取和平与自由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引起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占支配地位的世界上。东西方斗争

* 原诗中的这几句应为“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译注

** 上面援引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只争朝夕。”如果照英文译文重新直译为中文，就是“这样多的事情总是迫切需要赶紧做……抓住一天的时间。抓住一小时的时间。”此处“抓住时机”一语系仿其意而用之。——译注

是这个时代的主导特点。苏美两国在欧洲和亚洲前线彼此对抗，在中东和南亚的区域性冲突中支持对立的附庸国。在整个不发达世界的内战中互相斗争。然而，今天一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已经名声扫地，再也不会复活。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有了一个新的非共产党政府，这个政府一心想到它国内的严重问题，再也无法在国外扮演一个执牛耳的角色。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上，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必须重新制订我们的对外政策，以应付这种全新的形势。对美国左派和右派的许多人来说，对苏联作为一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衰落作出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是退而实行一种新孤立主义。然而在今后几十年，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将是必不可少的。

在过去三年中，世界发生了环滑车式的急转突变，人们先是抱很大的希望，接着幻想破灭，接着又欣快异常。1989年，随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我们抱有的期望越来越高。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垮台。柏林墙倒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政治改革。超级大国的合作加强了。不发达世界的区域性冲突减少了。重要的传播媒介、大学和思想库中的流行的看法是：我们正在看到一种和平与自由的世界新秩序开始出现。

在1990年，前一年的变革开始完全倒转过来。东欧的新民主国家面临改革的痛苦。苏联的共产党反动派恢复了元气。戈尔巴乔夫猛然使改革停下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入侵并掠夺科威特。美国和它的临时结成的联盟中的伙伴不得不在波斯湾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不发达世界的区域性冲突仍然无法轻而易举地解决。人们原来指望世界会变得比较和平，结果这种憧

憬变得象幻景一样渺茫。冷战曾经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得以维持下去，而冷战结束并没有结束小国卷入热战的威胁。

在1991年，这些事情被两件大事盖过了。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取得对伊拉克的决定性胜利，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在2月被赶出科威特，美国对自己作为世界上的一位领袖的地位的信心恢复了。比这件大事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世纪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之一：8月24日，苏联的自由力量不战而打败了共产主义力量。正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揭开了本世纪的极权主义恐怖统治的帷幕一样，新的苏联革命使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和名声扫地的政治制度的最后一幕的帷幕降下了。虽然戈尔巴乔夫仍然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新政府中的部长们是非共产党人。

这些呈鲜明对比的大事应当能使我们认识到，现实的世界不是环绕着关于“和平全面实现”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运转的，而是环绕着地缘政治学的持久的现实情况运转的。虽然目前的局势发展是值得庆幸的，但是我们不应当过于兴高采烈。在国家相互竞争的世界上，利益冲突和民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促进自由和维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善于利用美国的威力。只有从过去三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好好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和弘扬我们的价值观念。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一直是共产党人的侵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冷战就开始了。在1939年的声名狼藉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掩护下，莫斯科并吞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战前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大片地区。在大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扶植了共产党傀儡政府。苏联军队从纳

粹德国手中“解放了”东欧，但是共产党的解放对这些国家来说意味着一种新的暴政。斯大林向他的俯首帖耳的附庸输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苏联使用的野蛮手段：摆样子的公审、政治清洗、强迫劳动营和大规模恐怖行动。在铁幕落下的时候，东欧沦入极权主义的黑暗统治。

东欧只是冷战的第一个战场。在随后的年头，苏联在1945年并吞了日本的四个岛屿，在1946年试图瓜分伊朗，在四十年代末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共产党游击队，在1948年帮助建立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在1948年试图使南斯拉夫铁托的独立自主的共产党政权屈服，在1948年封锁西柏林，在1949年帮助毛泽东的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在1950年支持共产党北朝鲜进攻南朝鲜，在1953年镇压东德的一次工人起义，在1955年和1958年在关于金门和马祖问题的两次危机中支持北京，在1955年向埃及出售武器，从而引起中东军备竞赛，在1956年在布达佩斯街头屠杀数以百计的匈牙利自由战士，在1956年支持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夺取苏伊士运河，在1959年在古巴帮助建立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在1960年帮助刚果的共产党革命分子，在1961年建造柏林墙，在1962年试图在古巴放置进攻性核导弹，在1965年和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向印度提供武器，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支持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冒险行径，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在1970年支持叙利亚和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推翻约旦政府的活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北越对南越、老挝和柬埔寨进行的战争中向北越提供必不可少的援助，在1973年供应和支持叙利亚和埃及对以色列的战争，在1974年支持共产党人在埃塞俄比亚发动的政变，在1975年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扶植共产党政权，在1979年帮助共产党桑地诺分子在尼加拉瓜

掌权，从七十年代末起向萨尔瓦多的共产党游击队供应武器，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在1981年支持波兰共产党政府镇压团结工会和强制实行军事管制，训练和支持许多国际恐怖集团，通过它在东德、保加利亚和阿富汗的附庸进行国家支持的恐怖活动，并参与在世界上每个角落施展的另外几十起发动政变和革命的阴谋。

虽然在冷战中有其他冲突来源，但是没有任何来源在范围和激烈程度方面比得上莫斯科的扩张主义。苏联虽然从来没有正式宣战，但是开展了一场空前的直接和间接进行侵略的运动。尽管莫斯科在它的外交和宣传中有时也主张“和平共处”或“缓和”，但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继续在共产党扩张活动的不祥的鼓点声中大踏步前进。

这一切在1989年似乎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不管往什么地方看，都可以看到固定的现实状况似乎被戏剧性事件打破了。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重大的改革。他放松了对报纸的控制，引起了批评苏联制度的浪潮。他允许进行部分自由的选举，从而导致共产党遭受丢脸的失败。他为私营经济活动开辟了一些有限的机会，这种活动为较繁荣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他改变了长期持有的对外政策立场，同意大大削减莫斯科在欧洲常规武器方面的巨大优势，并且第一次接受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的现场检查条款。更重要的是，随着独立的政治运动要求戈尔巴乔夫更加积极地推进改革，这些变化不久就有了燎原之势。

在东欧，动荡局面更加富于戏剧性。在八十年代，东欧民族主义和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的地壳构造板块蓄积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一次政治地震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使国外的共产主义名声扫地后，苏联集团立即出现了最初的裂痕。在国外的制裁和国内的政治僵局夹击之下，波兰共产党领导

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必须承认反共劳工运动团结工会合法。在共产党人在部分自由的选举中一败涂地以后，他们勉强把权力交给民主力量。在匈牙利，在党分裂成强硬派和温和派以后，连改革派共产党人也在选举中被赶下台。对许许多多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来说，匈牙利不久成了通向自由的道路。由于这种外逃的浪潮使红色德国鲜血流尽，共产党领导承认有必要进行民主变革，从而在自己的死刑执行令上签了字。莫斯科没有进行干预来挽救它的最高权力的堡垒——东柏林，接着，大规模示威把克里姆林宫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附庸赶下了台。在一年之内，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受东欧的政治地震影响，第二年这次地震的余震袭击阿尔巴尼亚，把它的强硬派共产党领导人赶下了台。

在不发达世界，七十年代的苏联扩张主义浪潮在八十年代后退了。得到美国支持的装备差的阿富汗抵抗力量把共产党军队打得疲惫不堪，迫使莫斯科接受丢脸的撤退，并粉碎共产主义不可扭转的神话。在安哥拉，数以万计的古巴军队和苏联顾问没有能压服得到美国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自由战士，罗安达只好勉强接受一项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和举行自由选举的协议。在东南亚，随着国际调停在走向以政治方式解决柬埔寨内战的目标方面取得进展，越南从柬埔寨撤出了它的军队。在得到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压力下，桑地诺政权接受了一项举行自由选举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使非共产党人在1990年初当权，这件事使克里姆林宫和美国的大多数自由派观察家感到震惊和意外。西半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得不在古巴强制实行紧缩措施，以防止经济完全崩溃。

甚至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重要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也有一百

万示威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中国领导人后来进行的镇压粉碎了民主的希望，使全世界感到愤慨。

1989年的变化扩展到共产党世界以外的地方。在进行长达10年的激烈的堑壕战并死伤120万人以后，两伊战争结束。纳米比亚得到独立，并且选出一个新政府。南非的领导人承认有必要建立一个非种族社会，并且坚决采取行动把种族隔离政策束之高阁。美国对巴拿马进行的干涉推翻了曼努埃尔·诺列加的独裁统治，使以合法方式当选的政府当权。在其他地方，南朝鲜、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新的民主政府站稳了脚跟，并加强了从长远眼光看来它们将取得进展的希望。

看一看1989年正负面对照表（9场民主革命解放了1.22亿人），我们不禁期望我们正在进入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抱这样大的希望虽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是没有根据的。世界正在进入没有航标的水域。以往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中央管制经济成功地转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所有持久变革都是渐进的，是以不断发展的传统和制度为基础的。革命的剧变可能改变世界的面貌，但是很少改变世界的活动方式。历史上的持久变革不是通过滚滚浪潮出现的，而是通过不可抗拒的缓缓流动的潮水实现的。

1989年的事件引起的三个神话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前途的辩论中占支配地位，这三个神话是：

关于一种历史宣告结束的神话。许多人说，由于共产主义失败，自由民主主义胜利，冷战结束，因而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武装对抗的历史被埋葬了。他们说，市场经济和代议政体现在已经被普遍认为优于中央集中规划和独裁政体。成为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的将不是军队的大踏步前进，而是技术的大踏步前进，不是思想上的斗争，而是市场上的斗争。他们得出结论说，美国应当宣

布胜利然后回家了。

认为一种历史已经宣告结束的看法是浅薄的、不切实际的。虽然共产主义已经遭受几次惨重的失败，但是共产党政权仍然统治有13亿人口的12个国家。共产主义是一个名声扫地的意识形态，但是共产党人仍然能有效地利用武力来取得和保持权力。此外，冷战趋于消失并不意味着国际冲突结束。几十场内战和区域性战争仍然是建立在部落、种族、民族或宗教仇视基础上的古老的斗争引起的。核国家从来没有相互打过仗，但是由穆斯林组成的巴基斯坦和由印度教徒组成的印度为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冲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核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战争。随着东西方紧张关系缓和，对萨达姆·侯赛因之流的潜在的区域性侵略者的约束也将会放松。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220⁺万人已经在“小规模战争”中丧命——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的人多800万。即使没有超级大国的冲突，在这些战争中死去的大多数人也是会死的。虽然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中，意识形态冲突也许不占主导地位，但是这个时代的暴力色彩可能变得比前一个时代更浓。

宣布一种历史已经结束的人夸大了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思想的胜利。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如此广泛地被接受为持续增长的基础，选举也从来没有如此广泛地被宣布为有限制的和负责的基础。然而对立的思想并没有被赶下舞台。在华盛顿和西方其他首都的精英分子的宴会上，鼓吹从生一直管到死的福利国家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的人仍然有势力。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里还很活跃，象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样的激进的意识形态在中东还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决不当低估历史的不可预测的性质。事实已经证明，

先前主张“一种历史已经结束”的人是错误的。200多年以前，伊曼纽尔·康德曾经预言，由于民主制度在全世界不断推进，“永恒的和平”近在眼前。然而列宁的共产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只不过是推翻他的预言的少数出人意料的东西而已。不管这些意识形态是多么不合逻辑和不近人情，信奉这些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的确取得了权力，并且拚命利用这种权力来促进他们的畸形的思想。先前理性和政治是分道扬镳的。我们不能忽视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正如保罗·约翰逊所说的，“历史上的教训之一是，不能把任何文明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决不能认为它的永恒性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你处理不当，你犯了够多的错误，那么你不久总会遇到一个黑暗时期。”

关于军事力量不再有意义的神话。在苏联在阿富汗遭到失败、东欧发生“软绵绵的革命”以后，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军事力量不再成为政策的极重要的工具，也不再是对外政策的基石。有人说大国之间的相互依靠已经使得使用武力成为没有意义的事。另外一些人认为，无论从耗费的力量还是从世界舆论看，进行战争的代价都大得使人吃不消。还有一些人认为，随着冷战趋于消失，经济力量和“地缘经济学”的重要性超过军事力量和传统的地缘政治学。他们得出结论说，美国必须把剑不是铸成犁，而是铸成芯片。

虽然经济上的相互依靠限制了每个国家的行动自由，但是这并没有使军事力量变得没有意义。虽然冷战结束大大减少了西欧对安全感到担心，我们的北约组织盟国还是知道，在苏联和东欧局势空前不稳定的时期，缔结大西洋两岸的安全条约和美国在欧洲保持一支可靠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对于保证和平和安全是不可少的。